

韩山元： 一颗游子心，永远向海南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

“山叔走了。”8月上旬，新加坡媒体刊发了这条饱含情感的讣告：“山叔走了。如果在他74岁的人生旅途中曾与你擦肩，希望给你留下一些快乐。如果他曾经给你感动，也请你与人分享。”

正在准备新加坡国庆日活动的华侨们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一同深切怀念这位温和宽厚、崇德尚学的华文报人、文史学家——韩山元。远在海峡这头的海南大学教授詹长智、鲁朴等人，在得知消息之后也是长叹不断：“这是海南侨界的一大损失。”

山叔走了。我想，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叹息和祝福伴他去往极乐，是因为他终其一生，执拗地向着故乡的方向，用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诠释了“爱国爱乡”的真正涵义。



韩山元先生在演讲 资料图片

海的那边才是家

没能料到，此生与韩先生仅有一面之缘。

2013年5月，他借回乡祭祖之机，第3次向海南省博物馆捐赠了《南支派遣军》画册及“新加坡军港区琼崖同乡会互助部会员卡”两件文物，这对研究侵华日军当时在华南地区包括海南的历史状况，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我到他下榻的酒店拜访，彼时情景还历历在目——韩先生戴着大框眼镜，颇有学者之风：“我要一杯咖啡，加奶、加糖。”原以为，会友谈天时有一杯醇香的咖啡做伴，是多年南洋生活给他留下的印记，后来才懂得，谈及那般身世对任何人而言都非易事，一缕温热多少能够带来些许安慰。

早在1938年底，韩先生的父亲就远赴南洋，经由新加坡至马来亚半岛谋生。1942年，日军占领新马，韩先生在马来亚半岛出生。日本投降后，韩家便举家迁往新加坡，自此扎下根来。

但是，在此期间，日寇也侵入了海南岛。韩先生的二叔加入了抗日游击队，却不幸被日军抓捕，捆绑在村里的大树上，用刺刀一刀一刀刺得血流如注。韩先生的奶奶不顾一切冲向前去，最终与儿子一同被日寇用军靴、枪柄踢打、撞击至死。

韩先生说起此事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直到几十年后，父亲带着我们回家探亲时，奶奶和二叔的尸骨仍然没能找到。80多岁的父亲捧着乡土哭得像个小女孩。

他说，妈妈，不中用的孩子回家了……”

他知道，父亲爱着留在故乡的亲人，更爱着这片牵挂了半生的土地。给他和3个兄弟分别取名“山”“川”“永”“壮”，就是父亲对祖国的美好祝福。毕竟，海的那边才是家。

韩先生的妻弟郑庭锦告诉记者，正是受到父亲的影响，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，韩先生就积极参与到反对新加坡取消华文教育的学生运动中去。

想为家乡做点事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韩先生及其同仁又开始活跃起来，向《南华早报》供稿以维持生计。再后来，韩先生就正式到《联合早报》任职，从此以媒体人的身份，在新加坡宣传中国文化和华文教育，为两地文化交流活动牵线搭桥。

巧的是，韩先生就职不久，就碰上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。借由这个机缘，时隔数十年后他再次回到了家乡。

那次寻亲之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，撰写的稿件《八方风雨汇琼州 十万大军下海南》，在《参考消息》上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出，在中国乃至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引起了强烈反响。很多琼侨对这样别开生面的新闻报道感到心潮澎湃，还有不少人拎上皮箱就准备回乡干事创业。

郑庭锦记得韩先生那次返乡的一个细节：当时，文昌各个村镇还没有路牌，韩先生与他找

了很久，才在一个土窑后面找着了回祖屋的路。韩先生马上想到，侨胞回乡寻亲，路牌的建设很关键。于是，他带动多方一同倡议，终于为家乡的道路装上了路牌。

后来，韩先生回乡的次数明显增加，每次回到家乡，都要按母亲列好的“清单”，挨个给亲戚朋友发点生活补助金。此外，他还根据父亲遗愿，将其骨灰挪到爷爷的墓旁下葬，并以父亲的名义向文昌中学捐资5万元。至今，学校里还有以其父姓名命名的教室。

即便如此，只要有人感念韩先生的慷慨，他便说：“我不是一个生意人，没办法给家乡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帮助，就想着多用知识来回馈家乡。”而这句并非虚言，几十年间，他多次往来新加坡与中国之间，为厦门大学、暨南大学、海南大学、海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演讲，同时多次向博物馆捐赠他在海外辛苦收集而来的日军侵华铁证。

郑庭锦透露，韩先生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能在海南省博物馆里专门开设一个“华侨馆”，用于陈列侨胞文化的史料和文物。可惜的是，他最终没能亲手促成此事。

金子般的赤子之心

詹长智也曾代表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邀请韩先生，以华侨在日军侵琼史上发挥的作用为主题来琼开办讲座。

“韩先生欣然应允，并且很快从新加坡过来履行承诺。”令詹长智更为感动的是，韩先生为讲好这堂讲座费了不少功夫，不仅回到祖居地采访亲历者，还到海南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，力求做到思想倾向性与历史真实性的有机统一，“正因如此，韩先生的讲座才娓娓道来，引人入胜，但又处处体现着他对历史问题的深刻思考。”

不得不提的是，韩先生每次回国讲座都是自付路费，不要酬金，也不愿意惊动无关人员。只

要讲座地点设在海南，他都借住在郑庭锦的家中，随身的行李除去必要的换洗衣物，就是一只塞满书籍的旧书箱，此外再不多提。

“我在国内时间比他长得多，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远不及他。”郑庭锦颇为感慨，人们常说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，韩先生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。他在退休之后，还去往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，“这样的年纪还要频繁往来于新加坡和厦门之间，若不是真有这样一颗爱国、好学之心，是万万做不到的。”

他无法停下脚步，只能不断充实自己，再把自己的所有尽数交到年轻人手上。因为他这一生最大的忧虑，就是侨三代、侨四代不再认同故乡的文化、故乡的人。

许多在新加坡听过韩先生讲课的华侨后代，都会对他在授课中频频提及的祖国产生浓厚兴趣。于是，韩先生便应学生需求，分批组织他们到中国游学，更多地亲近祖居地。今年3月，病重的他还不惜抱病行军，带队游历了云南等地。郑庭锦说，当时，韩先生已经病得提不动箱子了，全靠夫人陪伴扶持才能坚持完成这趟旅程。

与韩先生有着多年交往的海南作家鲁朴女士，得知韩先生仙逝的消息让她倍感伤怀。她与韩先生两年前的约定此刻变成泡影：鲁朴一直坚持的华侨华人口述历史得到韩先生多年的支持，本来已经计划好今年10月到新加坡开启琼籍华侨的系列采访，采访人物与提纲均已拟好，并得到韩先生的认可，未曾料想，抱病仍奔走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韩先生撒手而去，令人扼腕叹息！随着韩先生生命的远去，他也带走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生记忆，给海南华侨研究领域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春蚕到死丝方尽。山叔走了，带走许多的叹息和祝福。可是山叔来过，留下了金子般的赤子之心。图



韩山元先生(左)接受海南大学图书馆颁发的捐赠证书 资料图片